

90年前的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是救亡的呼声,民族的呐喊。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又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代是一个青年激情飞扬的时代,是一个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时代。列强侵袭,军阀跋扈,疮痍满目,民不聊生。面对黑暗现实,那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罗家伦语)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秋瑾“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的精神,是涌动在他们血管里的民族血脉。“新世纪的曙光”,是激励他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动力,使他们不至为光怪陆离的物质的闪光所迷惑。90年前那些有志于振兴中华的青年,有的提倡教育救国,有的提倡文化救国,有的提倡实业救国,有的提倡人格救国,有的提倡革命救国,主张各异,宗旨则一:救国。正是沿着爱国主义的阶梯,他们当中的先进分

青春飞扬的岁月

陈漱渝



子才最终找到了救国的指南,攀上了真理的高峰。

这是一个重估传统价值的时代,反对因袭、崇尚创新的时代,发展个性、不断进取的时代。“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笔下狂人的诘问,奏响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于是,启蒙者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了“吃人”,从“三纲”“五常”的说教里发现了“专制”和“奴性”。在批判旧道德的过程中产生了新道德的萌芽,在反对旧文学的过程中,绽开了新文学的蓓蕾。被守旧派斥为“驴鸣犬吠”的白话诗闯进了诗歌的神圣殿堂;被国学家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成为了文坛的正宗。鲁迅不仅引进了为中国读者所陌生的短篇小说样式,而且他的小说每篇都在文体上有所创新,从不重复自己。他谆谆告诫读者: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

真艺术,真的新文艺的繁荣要靠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阉将,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

这是一个博采众家、吸纳新潮的时代,“学术自由”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口号。1919年4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教育总长傅增湘信中重申了他的重要主张:“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之争。史学界出现了质疑古史和经典的“疑古学派”。围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与梁启超展开了辩论。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进行了交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

正是在论辩中逐步澄清了谬论,不断发展了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活跃的氛围下,青年毛泽东才摆脱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920年之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李大钊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政攻击的纪念日”。因此,这一天被定为中国青年节。用今天的年龄观念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很多前驱和骨干当时都是中青年:1919年,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钱玄同32岁,李大钊31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傅斯年23岁,罗家伦22岁……他们同时也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青年。

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前驱者的是:当今中国已经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那种任人欺凌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面对霸权政治,面对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做法,中国可以说不高兴,可以说不!但是,“五四”前驱者追求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五四”的根须是深植于爱国主义精神的沃土之中。我们纪念“五四”,就要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把先驱者的遗愿化为宏图!

(作者为鲁迅研究专家)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青春中国

1919年5月4日,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那个飘摇的时刻,“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杨振声语)。弹指间,90年光阴飞逝,春风又一次来临,春光更加明媚,“头上”云开雾散。

5月4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它提醒我们回到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回望那段让人感奋不已的岁月。

“五四”90岁了!护城河水依旧波光粼粼,青青杨柳依旧轻轻拂动,北大红楼依旧静静耸立,古老街巷依旧传出历史回声……尘封的记忆不会因久远而黯淡,历史却在反思和探索中变得丰盈。

“五四”90岁了!怀着“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毛泽东语)梦想的青年已是百年之身,“德先生”、“赛先生”已是我们熟稔的朋友,“少年中国”(梁启超语)已成“青春中国”,虎虎生气,凛凛生成。

永远的“五四”,青春的中国。曼妙春光中,朝阳和回忆穿越漫漫尘埃,映照中国挺拔的身姿。美哉!青春中国;壮哉!青春中国。——编者

“五四”乃众声喧哗的时代,并非某一集团、思想、学说的“独唱”,这点,稍加论证,不难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追问谁的“五四”,很可能拉出一大笔左中右或红蓝绿的陈年旧账。其实,理解“五四”的复杂性,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立场、学术背景、文化趣味的差异,还有南方与北方、都市与小镇、学生与市民等一系列区隔。其中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年龄及教养。就拿作为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来说,教授与学生,就有很不同的功能与定位。

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生爱国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由学生辈来完成的。对他们来说,曾经参与“五四”这一经历,是生命的底色,是永恒的记忆,是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惭愧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贬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

10年前,我与夏晓虹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包括13位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

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杨振声、匡互生、闻一多、梁实秋、郑振铎、冰心)。5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讨论“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10位当年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以当事人眼光来解读那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增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这一论争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多少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恒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除此之外,我正主持编撰《回到现场——北大学生“新文化”》,选择了几十位当年活跃的北大学生,利用档案、报刊、照片、日记、书札、回忆录等,钩稽其在“五四”期间的言论及作为,关注学生与教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等。当然,更包括这些学生日后的事业与功过、追怀与阐释。在我看来,这构成一道特殊的“新文化”景观。

当今中国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期,需要我们打起精神,竖起脊梁,与“五四”展开认真深入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推崇教授们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需要呼唤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及求索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是一次文艺复兴: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对人的发现,将士大夫所垄断的书写权归还给民众,让民众的语言成为全民族书写和思考的语言。

时至今日,“五四”的遗产仍然遭受着挑战:今年,反对简化字成为了公众话题,引起争议的绝不仅仅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化字方案,而是肇端于“五四”的文字改革进程。文字改不改、如何改当然应该由所有写汉字的人充分讨论,但在讨论中,我们不应忘记“五四”先贤的初衷:让书写不再成为特权,让亿万国人成为文化的主人,成为觉醒的、能够自我表达的主体。

这一初衷没有错。当你说简化字或白话文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时,就等于说放弃拉丁文造成了欧洲文化的断裂,这其中隐含着文化上的惊人错谬和倒退。“五四”这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不能被简化为几个关键词,更不能仅仅在关键词的水平上做出解释和回应,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壮阔复杂的探索和实践,涌动着对于建设现代中国、对于重塑民族精神的坚定承担。

所以,“五四”与欧洲文艺复兴一样,绝不仅仅事关文学和文化,在“五四”新潮中,一代知识分子“奋空拳,扬白手”(罗家伦语),与各阶层民众同声相应,为拯救中国,为在现代世界争我中华一席生存与发展之地而呼号奋斗,这是现代国家意识的确立过程,而国人的精神觉醒、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发展,正是这个过程的中题之义。

在晚近的一些学者那里,“五四”的“救亡”和“启蒙”这两个主题被描述为相互冲突的“东风”和“西风”,这种描述隐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后设的想象:似乎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另一样。后设性的历史眼光或许颇具学理趣味,但会使我们失去基本的现实感、失去对历史设身处地的体察和理解;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念演进过程,它一开始就是在纷杂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的

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变革运动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价值翻转为特色的伦理道德革命,这场伦理革命的核心精神是以个性解放冲击传统的礼教与家族制度,因而个性精神就构成了新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陈独秀倡导“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推崇个人独战多数的“易卜生主义”,鲁迅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周作人将人道主义阐发成“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五四文学精神最有力的理论说明。然而,五四文学又是真正忧国忧民的文学,是急于使中华民族摆脱苦难的文学,因而应充分认识这种文学精神的复杂性,简单的反传统与西化都难以阐发这场文化变革的真正内涵。

在“五四”人物张开臂膀拥抱西方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是对宗教文化孕育出来的于振兴国家有利的现代文化成果感兴趣,推崇个性自由与民主科学。即使在“五四”高潮的时候,中国文学传统的语法规则仍然潜在地制约着五四文学的精神及发展轨迹。如果对“五四”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时髦的西方文化多是体现在

伟大的文艺复兴

李敬泽



行动,它从各种紧迫的历史局面和事变中获得动力。

当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们立志建构“人”的文学时,他们表达了中国人从近代以来的大变中得到的最深刻的信念:去除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中的“跪拜”,成为“人”,成为站着的人,拒绝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屈膝,也拒绝在封建文化的压迫下屈膝。从“五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未放弃这一信念,“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共和国的创立者的宣言,是深刻地根植于“五四”精神的声音。

站着,传统才是属于我们的传统,才谈得上继承和发展。当一些后来者指责五四的“断裂”,指责“五四”“打倒孔家店”的鲁莽时,他们大概忘了,如果没有“五四”先贤绝然为民族开新路的精神,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这样的指责;我们也应该深切体察“五四”遗产的丰富性——今天,人们也常常忘了,正是“五四”开启了对中国传统的现代认识和整理,今日被顶礼膜拜的“国学”,岂是乾嘉旧学,皆为“五四”之学,都是自“五四”一代开始对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重新整理、认识和估价的成果。没有“五四”,我们可能会一直认为《红楼梦》、《水浒传》是不入流的偏僻之书,没有“古史辨”,我们可能依然沉迷于神话,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不会有确切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艺复兴的“五四”,解放了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解放了我们的传统。或许文化保守主义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必要的、有魅力的向度,或许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我们的祖先取更具温情的理解,但“五四”教给我们的终究是在批判中继承和接续,在批判中求活力充沛的新生。

(作者为《人民文学》主编、文艺评论家)

文学精神与文化传统

高旭东

当然,所谓儒道互补的现代演绎,就是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推崇个性精神与人格的张大;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与儒家文学追求“厚人伦”的合群性不同,它是关注个人命运的遭际;创造社的“为艺术”与道家的“为艺术”也不同,创造社是在五四文学个性精神感召下,张大主体人格。因此,个性精神才是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征,而忧国忧民的现世关怀则是新文学区别于基督教文化中产生的文学的特征。

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认识五四文学精神,怎样将外来的优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回望与前瞻

名人论“五四”

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成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陈独秀《敬告青年》

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

——李大钊《青春》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呐喊·自序》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切,更生了。
一切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风。
风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郭沫若《凤凰涅槃》

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

五四运动有三种真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是社会制裁的精神,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制裁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

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重要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因之科学思想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涌现出大批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唤醒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

——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

文化圆桌